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制度优势、方法原则及改革要求

张宪昌,刘兆赢,于东阳

(聊城大学 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性原则,在新质生产力高度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高度适配中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勇于改革的能动性原则,充分发挥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坚持统一而存差异的辩证性原则,通过辩证否定实现共同富裕层次的不断提升。坚持效率公平并重的一致性原则,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形成高水平组合。坚持增强共富能力的有机性原则,发挥共富共同体的共济性、有机性。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共富制度框架,创新共富带动机制,化解就业突出难题。

关键词:共同富裕;制度优势;方法原则;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4)06-0010-08

收稿日期: 2024-09-13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2CKSJ0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方法论研究;

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支持计划”(2021RW031);工匠精神驱动创新发展的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张宪昌(1983-),男,山东济宁人,聊城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刘兆赢(1999-),女,山东潍坊人,聊城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于东阳(1978-),男,吉林吉林市人,聊城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6.015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明确写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①这是我们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②以来,共同富裕已由全局性蓝图擘画转化为区域性实践方案。但是,实现共同富裕是世界级难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特点。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本文在分析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尝试从方向、主体、过程、内容与机理五个维度厘清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旨在从方法论层面探寻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路遵循,以达到合价值性、规律性与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从而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改革要求。

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一) 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制度桎梏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方面仍然具有较为突出的先发优势,但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延续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来的两极分化。随着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绝对福利水平尽管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而得到提高,但两极分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究其根本原因,在于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0页。

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生缺陷。

包括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资本至上，以资本逻辑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只能产生两极分化，不能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创立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指出了生产资料由社会构成人数较少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根源。为了统治需要、避免引发暴力革命，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社会改革，调整生产关系，比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实施高额遗产税，甚至让本国工人阶级享受一部分国际剩余价值，确实让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从根本上改变不了生产资料由资产阶级私人占有这一产权制度，改变不了资本主导一切、处于有利地位的交易制度，改变不了资本与技术合谋加重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取何种学说进行“革故鼎新”，都决不会也不可能克服国内两极分化，更遑论实现全人类共同富裕。

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为例，近五十年来美国中产阶层发展呈现的不是上升趋势，而是萎靡之相。根据 Investopedia 发布的资料，1971~2021 年美国中产阶层占比由 61% 下降到 50%，而低收入阶层由 25% 扩大到 29%，富裕阶层由 14% 增加到 21%。从全球来看，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world）统计的数据，2022 年全球前 10% 的高收入成年人口获得了 53.2% 的税前国民收入，而最低 50% 的成年人口仅获得 7.6% 的税前国民收入；全球前 10% 的最富裕成年人口控制了 75.8% 的净财富，而最低 50% 的成年人口仅拥有 1.7% 的净财富。在资本主导全球市场逻辑之下，一些新兴经济体比如南非 1980~2022 年收入绝对不平等程度不是缩小了，而是在扩大。

（二）社会主义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阐明了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共同富裕的主要特征。马克思指出：“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①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 年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富裕特征及其实现方式，即：“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②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系统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③ 作为价值旨归和终极目的方面，处于核心地位和突出位置，彰显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至少具有五大制度优势。一是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大优势，为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了具有强大领导力、自我革新力和动员执行力的组织保障，能够坚定方向、自我革命、不断创造，从而不断推进各种制度创新，提升组织效能。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④，其目的是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和分配制度，能够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优势。先进文化制度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确立了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00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09-710 页。

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 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90 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22 日。

观凝心聚力,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能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内驱动力。四是城乡统筹的民生保障制度优势。我国民生保障制度具有覆盖人口多、涉及领域广的鲜明特点,涉及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脱贫攻坚、就业促进、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供给等关于民众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方方面面,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基础性支持。五是和平发展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中国所要走的共同富裕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更不走西方历史上殖民扩张、资本掠夺的罪路,而是走出一条依靠本国人民辛勤劳动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人类文明新路。

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方法论原则遵循

(一)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性原则

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②,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体现公平正义的生产关系高度适配的有机辩证统一^③。建构在唯物史观基石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阐明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永不消失的内在原因,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结论。

在“两个必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公共占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重点任务,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方向性的理论准则与战略面的基本架构。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来看,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实质是社会主义国家新质生产力不断高度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不断改革优化形成高度适配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共同富裕有望首先在社会主义一国实现。202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94万元,折合美元约1.27万美元。经过十多年奋斗,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④。

(二) 坚持勇于改革的能动性原则

何谓能动性?《哲学知识全书》给予了通俗意义上的一般性解释,即“主观能动性”,指人类所特有的在实践基础上自觉地、主动积极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作用^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论证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⑥的能动和受动属性,并将二者统一起来。由于人“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⑦这一力量,是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力量。这一力量,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追求共同富裕和自由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的意义,从而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⑧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是一种意识能动性、自主性、创造力内嵌于实践的为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而不懈奋斗的创造性活动。

经过70多年建设、改革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地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14页。

②参见辛向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第5页。

③张宪昌:《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方法论特征》,《理论视野》2023年第12期,第33页。

④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⑤张永谦:《哲学知识全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⑥⑦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第211页,第223页。

性,积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①,不断创新,走向了以共同富裕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发挥地方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首要体现在树立科学的财富观。现代文明厘定的财富范畴,不同于传统工业文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狭隘定义,不仅包括物质财富,还包括精神财富、生态财富,以及生产和创造各种财富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②其次,体现在树立科学的财富创造观。“劳动是财富的源泉”^③,一切知识、技术、管理等其他要素的创造均来自于劳动实践。在生产过程中,劳动与知识、技术、管理、资本、数字等要素共同发挥作用,形成单个要素所不能具有的生产合力。因此,必须在全社会崇尚劳动。同时,“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④。

(三) 坚持统一而存差异的辩证性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矛盾形态不断消逝,新的矛盾形态不断呈现。作为新的矛盾形态,共同富裕同样寓含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征。

从共同富裕的区域实现过程来看,在一国范围内,衡量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基本水准具有可核算的统一性特点。在该国所辖的各个地区,衡量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具体水准会有所差异。从共同富裕的主体实现过程来看,单个体或者家庭由于受教育水平、勤劳程度、创新能力、所处行业、发展机会、家庭禀赋等各种因素制约,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存在质的不同,又存在量的差异。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群体收入状态表现为一部分先富,另一部分后富,还有较少的一部分人处于富裕的边缘。因此,从理论逻辑来看,共同富裕“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可能齐头并进”^⑤。

辩证的认识不同主体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差异性与实现过程的渐进性是共同富裕由理想变为现实的前提准备。共同富裕的实践发展是通过它自身的辩证否定实现的。正如人们生活曾历经饥荒→挨饿→温饱→小康→全面小康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一样,共同富裕本身具有层次性,也必然经历一个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发展过程。经过否定之否定,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不断提升。承认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能鼓励发挥地方与群众的创造精神,呈现丰富多彩的探索途径,避免从政策路线上走向平均主义的误区。承认共同富裕实现过程的渐进性,才能保持战略定力,遵循共同富裕实现的内在规律,通过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向纵深发展。

(四) 坚持效率公平并重的一致性原则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基于唯物史观的创新发现、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深度建构,马克思客观审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效率和分配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以往生产高效率的原因:一是协作。“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必然是集体力。”协作扩大了劳动的空间范围,缩小了劳动空间范围,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会节约非生产费用”^⑥。二是分工。分工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减少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三是机器的发展。机器被资本家“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确实“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⑦。

但是,机器使用与劳动力使用存在一种替代关系,“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

①《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年,第99页。

②⑤《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71页,第506页。

③《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8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⑥⑦⑧《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8页,第381页,第482页。

工人‘过剩’”^①。机器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在短期内决不是福音。资本主义生产高效率的结果，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②。马克思提出彻底解决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问题的根本路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实践经验表明，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较快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不能违背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完全消灭，建立在生产资料人人所有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由此，决定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效率公平并重提升成为新时期在全社会更高物质水平、更高文化层次上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重要原则。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本质上是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形成高水平组合^④。党的二十大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写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左右^⑤，按不变价格计算，是2020年的3倍。同时，在2012-2022年我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好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⑥。

（五）坚持增强共富能力的有机性原则

根据《辞海》的解释，有机是指事物构成的各部分互相关联协调，而具有不可分的统一性，就像一个生物体那样的^⑦。马克思把自然界中生命有机体的概念，应用到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分析中^⑧，形成了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变化、联系、发展是社会有机体的普遍特征。从共同富裕实现主体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是一个有机共同体。从实现过程来看，共同富裕是一个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富并且富裕水准不断提升的动态变化过程。

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机性是指共同体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增强共富能力，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所体现的共同体内部及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协作，表征为共生性、协调性、共济性、共享性以及和谐性特点。其中，共生是有机共同体的存在基础。没有共生，有机共同体将不复存在，共生性是共同体有机性彰显的第一属性。协调是有机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协调性是共同体有机性彰显的重要特征。共济是有机共同体个体的利他体现和群体特征，是增强有机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方式，是共同体共富有机性彰显的关键特征。共享是有机共同体的分配结果，是共同富裕的基础特征。和谐是有机共同体的理想秩序，是有机共同体共生、协调、共济、共享的目标状态。

共济建立在利他的基础之上，是探索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道义体现。利他是指给予他人方便和利益不求回报。从生发逻辑上，利他可以大致分为基于血缘关系的亲缘性（地缘性）利他、基于经济交往的互惠性利他、不求回报的纯粹性利他^⑨三种模式。亲缘性利他模式在先富带动共富、增强共富能力方面具有血缘与地缘关系的显著特点，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原初模式，但容易出现“内卷”效应，表现为一定的狭隘性。互惠性利他模式是指通过产业投资、要素协作、资源聚合达到先富后富双方互惠、增进共富效应的一种模式，具有覆盖面相对较大、持久性强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互惠性利他模式有

①②《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1页，第742-74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

④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核心问题》，《人民论坛》2023年第13期，第13页。

⑤许召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万至3万美元阶段的实际增长任务》，《中国经济时报》2023年2月22日。

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2页。

⑦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6版彩图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774页。

⑧参见庞元正：《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系统思想》，《哲学研究》2023年第4期，第24-27页。

⑨宋晔、曹琦飞：《道德利他的生发逻辑及现实超越》，《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42期，第65-67页。

望对乡村振兴、推进农村农民富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不求回报的纯粹性利他超越了血缘、地缘和利益的关系束缚，不求回报的帮助毫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后富，使之在未来某一时间点进入共同富裕行列。新时代更好发挥先富带动后富作用，需要发扬利他精神，做到和衷共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改革创新实践要求

（一）把握共同富裕实践方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了共同富裕新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空间，形成了以浙江片区为重点突破与全国各地以点带面相结合的中国共同富裕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共同富裕范畴的国别性、现代性，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内涵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①。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经济回升压力，把握共同富裕实践方向，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不断完善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坚持党对政治建设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政治保障。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坚持党对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促进精神富裕。坚持党对社会建设工作的领导，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探索社会企业发展模式，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坚持党对生态建设工作的领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生态基础。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创造安全的空间条件。“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共富制度框架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推进共富型经济制度创新。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公有制基础，确保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②，增强国有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积极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鼓励发展城乡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充分挖掘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先富带动后富中的潜力和空间。另一方面，“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财富发现、财富创造和生产管理的优势，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开展“回报家乡”专项行动，全面促进乡村振兴，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探索先富带动后富路径。

“完善产权制度”，“完善流通体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人民群众获得多元化的要素收入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完善要素价格决定、贡献评价和报酬决定等市场机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③。改革优化分配关系，正确处理市场、政府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推进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制度协同创新。在初次分配上，创新和完善支持勤劳创新致富的制度设计，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份额。鼓励企业优化职工薪酬制度，增加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在职工报酬总额的比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制度，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再分配上，创新优化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财政工具组合，进一步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分配职能。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动态调整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水平，调节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在可持续发展中缩小居民

^{①②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收入差距。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财政转移支付推动共同富裕的精准性。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地区功能定位，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中西部等财力薄弱地区的转移收入，促进地区间财力分布均衡。“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①。在第三次分配上，建立健全回报社会、回报家乡的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统一、开放的慈善服务信息平台，健全慈善组织监管制度，优化慈善组织监管服务，推动慈善组织规范化运作、科学化管理，进一步提升慈善组织的社会诚信度。

（三）锚定共同富裕阶段目标，创新共富带动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能动性思维转化为改变现实世界的创造力，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长期目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党的二十大将共同富裕写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基本内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基于党的领导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职责要求，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构建合理的阶段性目标，明晰任务分解要求。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创新探索，积极建立相应的工作推进机制与评价考核机制，探索推进区域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立足我国四海一家、同舟共济、家国情怀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新时代精神，创新先富带动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激励设计，探索先富带动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典型模式。通过区域内以及跨区域协作制度安排，推动后富地区改革开放，以承接先富地区产业或发展当地特色产业为主要方式，实现人才、技术、资源、信息、管理要素共享，扩大后富地区产品销路，增加后富地区就业机会，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通过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优化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履行社会责任倡议，鼓励企业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回报家乡。通过完善公益慈善体系，加强慈善监管，规范网络慈善生态。通过鼓励支持社会企业，发挥社会企业在联农带农、就业促进、医疗健康、托育养老、助残帮扶、等社会领域既不同于传统企业、也不同于纯粹公益组织的独特功能，以商业手段解决弱势群体发展的社会问题，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四）紧扣共同富裕现实需求，化解就业突出难题

当前制约我国共同富裕的经济因素主要有发展动力不足、收入差距较大等。发展动力不足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而国内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消费者整体购买欲望不强，另一方面在于消费者新增购买力不足。后者主要由于收入较低，而收入较低原因在于未就业抑或就业质量不高。投资需求不足，会影响潜在就业。因此，制约我国共同富裕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因素是就业。就业与收入直接关联，就业总量决定了劳动者收入总量。就业总量的规模水平和发展速度的高低，既是观察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就业结构的空间格局、行业分布决定了收入结构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行业差距。劳动者收入水平，直接决定家庭消费水平，影响生活质量、下一代子女教育拓展、医疗健康服务分享等。因此，对于劳动者而言，“就业是最大的民生”^②。

当前我国就业存在总量不充分、结构不均衡等突出问题。从总量不充分来看，2018～2022年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8年的89729万人下降到2022年的87556万人，就业人员从77586万人下降到73351万人。尽管两组数据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就业人员数下降了5.46个百分点，比劳动年龄人口多了3.04个百分点。从相对值来看，2022年我国就业人员数量比重为83.78%，比2018年下降了2.69个百分点。从就业结构不均衡来看，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差距。2018～2022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数占全国就业人员数的比重由55.96%上升至62.62%，农村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数的比重由44.04%下降至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8页。

37.38%。化解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进一步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继续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发挥现代服务业在吸纳新增就业的主力军作用。推动数字经济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在融合过程中通过创新创业,创造就业岗位,吸纳就业人员。“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①,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以及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不断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and Reform Requirements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ZHANG Xian-chang, LIU Zhao-ying, YU Dong-yang

(Business Schoo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Making advances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scientific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making advances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Firstly, we always adhere to the directional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hich is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high adaptation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Secondly, the initiative principle of being proactive in reform and innovation is adhered to, which gives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and creative spirit of the practice subject. Thirdly, the dialectical principle that the level of prosperity is not only unified but also different is adhered to,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dialectical negation will be realized. Fourthly, the consistency principle that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s commonly promoted is adhered to, which forms a high-level combination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Fifthly, the organic principle of promoting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apacity for common prosperity is adhered to, which gives play to the mutual help and organic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rther deepen reforms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shared prosperity, innovate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shared prosperity, and resolve prominent employment problem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责任编辑 如初]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